

红色故事

曙光社领导下的川黔边区纵队

冯光勇

解放前夕,在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遵义一批青年学生,通过“读书会”等形式,积极学习革命理论,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秘密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曙光社和革命武装力量“川黔边区纵队”,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与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历史名城遵义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纵队的建立

解放前夕,遵义的国民党政权垂死挣扎,蓄意实施破坏计划。为粉碎敌人的阴谋,确保遵义这座贵州重要城市的完整解放,1949年10月,曙光社积极响应党组织“遵义是贵州的重要城市,一定要想方设法确保完整解放”的指示,果断作出决定,把争取到的投诚人员组建一支革命武装力量,与反动派进行斗争。这支队伍被命名为“川黔边区纵队”(以下简称“边纵”),潘名辉任政治委员,任魂(刘兆富)任司令员,詹周(李必泽)任副司令员,吴光被任参谋长,喻圣训任副参谋长。纵队下设“边纵五支队”,由王慎公任城工部负责人。行动时,“边纵”队员统一佩戴“型泽”标识。

“边纵”下设五个支队,一至四支队的番号没有使用,只有绥阳使用了第五支队的番号。“川黔边区纵队第五支队”(以下简称“边纵五支队”)由詹周任司令员,李先准任政治委员,吴元功(起义军官)任参谋,袁本慎和陈淑珍(均为曙光社社员)为医务人员。

“边纵”的基本部队是起义的葛德威连、张健夫连、冯正奇营、湛伯武警察大队、熊灿昭中队及王琦营、张肇奎“联防大队”和第四十四军陈家骥营,以及曙光社绥阳支部和团溪支部掌握的农村武装,总兵力1600人左右。

主要革命活动

政治瓦解敌人。为防止敌人进行破坏活动,“边纵”成立后,立即印发《告黔北人民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川黔边区纵队司令部布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过可靠的关系,秘密散发给伪政府的党政军

和行业头面人物;对没有可靠关系的人员以及边远地区,则采取邮寄的方式送达,同时附上一封信:“xxx先生:我们奉命通知:你应负责保存所部一切资料档案,听候接管,解放后论功行赏,量才录用。如拒不执行命令,定当严惩不贷,切勿等闲视之为要。”落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川黔边区纵队城工部”。敌人收到信后,胆战心惊,不敢执行伪政府的“应变计划”,从而达到破除谣言、安定人心、保护城市的目的。

争取头面人物起义。经过“边纵”的努力,除了第四十四军军长陈春霖、专员卢杰以及宪兵连长杜宁等人外,先后率队起义的有:国民党贵州第二绥靖区司令吴剑平、贵州省绥靖公署副主任陈铁、275师参谋长兼遵义留守处主任李益昌、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主任李厚德,“联防指挥部”指挥长、帮会首领张肇奎,第四军官总队副队长鲁若参。吴剑平及时提供重要军事情报,为队员进出城提供方便。伪电台台长每天报告收到的消息,使“边纵”随时掌握敌人动态。陈铁借100元大洋给“边纵”,使活动经费有了保障。

保护物资、工厂及基础设施。在“边纵”的周密指挥下,起义部队和民主进步人士共同努力,成功守护了重要物资、工厂及基础设施。英勇挫败了伪县长3天内把仓库烧光的阴谋,茅草铺仓库30多万斤粮食得以保存下来;巧妙化解了卢杰“开仓散盐”的毒计,400吨食盐得以完整保存;运用计谋使乌江大桥、清深桥、运亨大桥免遭破坏,让陈春霖炸桥的命令未能执行,确保了川黔公路和遵涪公路的通畅。伪军政部第七军械总库遵义分库内存有大量重要军事装备,包括子弹100万发、各种炮弹1万多发、手榴弹45万枚以及大量炸药和其他军事器材。在“边纵”的积极争取下,成功说服监管的官兵接受其指挥,使得这批装备得以完好保存。此外,《民锋日报》社、大兴面粉厂、酒精厂、福利电厂等重要设施也在各方努力下,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开展护城斗争。1949年11月20日,敌军在遵义城内频繁调动,散兵游勇在街

上乱窜,为防止敌人破坏,幸必泽、刘兆富、潘名辉带领“边纵”部队占领丁字路口,设立临时指挥所,控制制高点,设置警戒,带领武装人员在街市巡逻;命令电信局确保电话畅通,与重点保护的工厂保持电话联系;控制“联防指挥部”,改用“边纵”口令,强化站岗守卫。通过一系列措施,确保遵义城在解放前夕得到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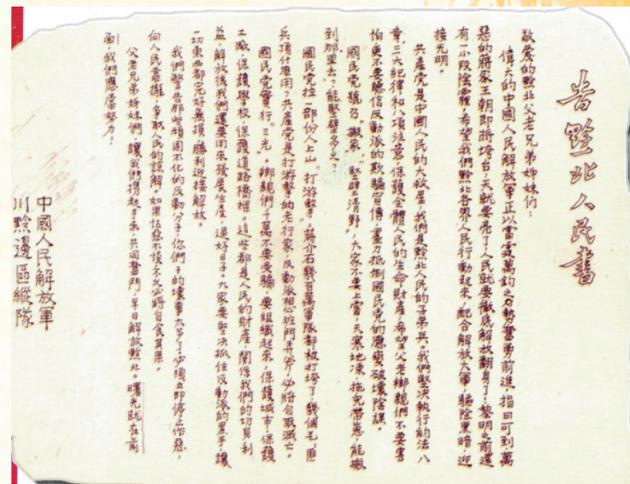
迎接解放。1949年11月19日,“边纵”派白仲乾、王永琪、何国仁到乌江下游孙家渡迎接解放军,他们向解放军二野第三兵团第十军第二十八师政治部主任高世平汇报了遵义的情况:敌人收集汽油,准备烧毁遵义城,请解放军在敌人破坏前解放遵义。20日,“边纵”派王慎公、梁仁德等到礼仪坝迎接解放军。

11月21日黎明时分,“边纵”迅速行动,在遵义城内各处张贴安民布告,稳定民心。随后,他们带领部队有序接管了仓库、电台、工厂、银行等重要设施,确保城市运转不受影响。同时,还积极组织群众为解放军的到来做好迎接准备。上午9时许,遵义城内欢声雷动,群众满怀期盼与喜悦,热烈欢迎解放军部队入城。随着解放军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遵义,这座历史名城宣告完整解放,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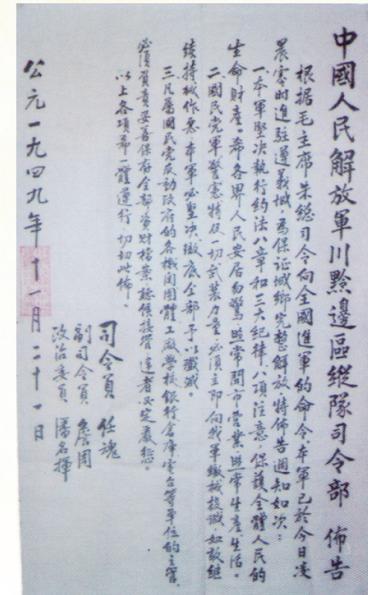
11月22日,“边纵五支队”和平解放了绥阳县尹珍乡(今旺草镇),并发布了安民布告。11月30日,“边纵五支队”成功解放了绥阳县黄杨乡和宽阡乡。

遵义解放后,“边纵”顺利完成历史使命,番号随之撤销。全体人员由组织统一妥善安排,一部分成员光荣编入解放军序列,继续投身于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另一部分则转入地方工作,积极参与地方政权建设与社会治理,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注:关于“川黔边区纵队”的名称,有的文献称为“川黔边区游击纵队”,这支队伍并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游击”战争,结合该部队司令部发布的布告和《告黔北人民书》及多数文献均使用“川黔边区纵队”名称,因此,本文也使用这一名称。(据《贵州政协报》)



↑告黔北人民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川黔边区纵队司令部布告

人物故事

梅光迪在遵义二三事

书同



梅光迪 (图片来源于网络)

梅光迪,1890年出生于安徽省宣城西梅村(今属南陵县)的一个书香世家。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3年通过留美考试先后就读威斯康辛大学、西北大学,1915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获文学博士学位。梅光迪留美回国后曾任南开大学英语系主任、东南大学英语系主任,于1922年在中国高校首创西洋文学系。

1936年梅光迪受竺可桢之邀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文系主任,1939年浙大文理系分设后,他成为浙大文学院首任院长直至其1945年病逝。浙大西迁办学时期,梅光迪在遵义工作生

活了六年之久。

1940年2月12日(正月初五)下午四时,梅光迪与同事黄尊生、费巩、田德旺等,搭乘一辆手车(车上挤了三十多人),风尘仆仆抵达遵义。因为租赁的房子为新建,内部装修尚未完成,一时不能入住,只好暂时住进了新亚宾馆,直至3月16日,他才搬进南门外城墙内石家堡李氏宅院5号屋。

石家堡5号是一栋二层楼房,中间用月亮门隔开,房东和租客各住一半。从街上回家,需先走过一个通道,然后进入李家花园。园子里三株百年树龄的山茶花,红白相间,衬托在精致的花墙上往外下垂,显出庭院深深几许的优雅。园子中央辟有一个小水池,里面建了一个小塔,养了些乌龟和金鱼。走过水池几步,就是二层楼住房。房子每层三个房间,有一个狭长的走廊。虽然没有电灯,也没有抽水马桶,但因为地势高敞,房子朝南,窗户又多,采光透气性均好,住着很舒服。

梅光迪本想与黄尊生、费巩、田德旺等同住,但黄尊生更愿意住宾馆,田德旺被房东家的狗咬了,吓得不敢再来,只好与费巩、李熙谋、王季梁、任美镛等合住。梅光迪为文学院院长、李熙谋为工学院院长、王季梁为师范学院院长,费巩为政治经济学教授,任美镛是史地系和文学院双聘教授,由于这里所住的院长较多,因而被人们称为“院长宝地”。注重养生的费巩教授,常常在花园旁的山茶树下练习太极拳。

梅光迪和李熙谋住楼上靠南的两间

房,并将中间的一间作为共用的客厅和餐厅。遵义的家具又多又好,价格便宜,因此梅光迪把自己的房间布置得很讲究:一张棕床、一张书桌、一个方桌、两把弹簧椅,桌子和床都漆得通红,看起来很有气派。后来又陆续添置了竹制书架、布躺椅、小桌椅、洗脸架等,衣食起居非常方便。

1942年5月初,梅夫人李今英,带着家人从香港来到遵义,见到如此适宜的环境,不禁大为赞叹:浙大的名气也太大了吧,不然房东怎么会把如此好的房子租出去。

自1940年3月16日起,直至1945年12月3日去贵阳看病后去世,期间除1942年房子要再次刷油漆,搬至中营沟6号杜松家暂住外,梅光迪一直住在石家堡,他那西装革履的翩翩绅士风度,给李家小房东李永颐留下久久难忘的印象,夸赞说:“光迪伯是个美男子。”

二

梅光迪是享有盛誉的宣城梅氏后裔,祖上既有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又有文学家梅鼎祚,山水画家梅清、梅庚,以及天文历算学家梅文鼎等。清代学者张廷玉曾大赞:“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宣之旧族首梅氏。”

1911年,梅光迪通过第三批庚子赔款留美考试,先后就读威斯康辛大学、西北大学、哈佛大学,主攻西洋文学。1919年秋学成回国,先后就任南开大学英文科主任,东南大学英语系教授、西洋文学系主任。1924年夏受聘哈佛大学,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讲授汉文及中国文学,是继戈鲲化、赵元任之后,

第三位任哈佛担任汉文教学的中国人。1936年秋应竺可桢之请,回国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文系主任。1939年秋起,任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

融通中西,是梅光迪矢志不渝的信念,浙大则是他实践教育理想的试验场。在他参与和主导下,学校规定,一年级学生都要读一年古文,而文、师两院学生还要再加一年历代文选课,其目的就是要使学生能独立看懂历代文选。此外,又要求各院学生都要读一年英文,而文、师两院学生要多读一年,理、工、医农各院学生还必须加选德、日、意、俄等第二外语,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理工科学生用书全部外文版,基本上与哈佛大学相同。因此,浙大毕业生的学生,不仅能看懂中国古代文献,又能看懂外国文献,诚所谓“通才”。

一天,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教授陶德来浙大访问,梅光迪陪他听课参观。当他看到讲课的教授,用娴熟的外语滔滔讲且论据翔实、引述渊博,感到大为惊讶和佩服,称浙大文学院的教学质量,可与英国任何大学的文学院媲美。

长期留学、工作海外的经历,使梅光迪对外语教学尤为重视。一天,张君川教授和他商量,想在教授莎翁戏剧时,学习哈佛大学教学方法,采用演剧的方式,因此拟成立一个外语演出剧团。梅光迪欣然赞成。但训导部以学生容易闹事为由,不许组织。于是学生们想出另一个办法,成立外文系戏剧讨论班,再以讨论班的名义演出。

学生们恭请他为总顾问,他欣然同意。在讨论班首次演出英语剧《蠢货》和《寄生草》时,他亲临观剧,并提出很多中肯的改进意见。浙大这个戏剧讨论班,后来发展成为浙大的演出团体。该团体配合当年学生运动,承担演出任务,成为传播民主爱国思想的一支有生力量。

三

为了支撑战争时的军事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币,导致严重通货膨胀。梅光迪每月薪水600元,1940年3月清酒席3桌,花费90元(含酒水20元),到6月,每元可买20个鸡蛋,每斗米卖5.2元。到1945年3月,薪水加办公费、研究费、米油等生活补贴,共计40860元,而此时银元物价,上等米每老斗要3600-3700元,银耳上等550元一两,理发每次150元,三个人一顿早餐500元,石家堡屋后李子卖到每斤300元(上年仅10余元)。

为了解决生计困难,许多家庭开始变卖物品。梅光迪也按照夫人开列的清单,卖去一张桌子、两个床头柜、四张藤椅、四把木椅、四把小椅子。

1944年冬,梅光迪开始发病。1945年4月,一度辗转重庆问诊就医。7月20日,再回遵义。7月31日,参加校阅新生试卷。8月1日,终日卧床,呕吐六次。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遵义后,城中心丁字路口一带人山人海,高歌欢庆。闻听此讯,梅光迪喜而不寐。

后来,他在老城一店铺买得一串爆竹,费二千元,约五百响。这串爆竹,燃放了他心中的喜悦,也宣泄了久久积压在心底的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